

许纪霖作品集

# 优美 是否离我们远去

社会文化评论精选

许纪霖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许纪霖  
作品集

# 优美 是否离我们远去

社会文化评论精选

许纪霖 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社会文化评论精选 / 许纪霖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

(许纪霖作品集)

ISBN 978-7-108-05991-8

I. ①优… II. ①许… III. ①文化研究—世界  
IV. ① G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8150 号

责任编辑 龚黔兰

装帧设计 刘洋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http://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6.25

字 数 210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 总序：狐狸的自白

假如一个人的学术生涯，可以从考大学那一年算起的话，那么，从1977年到今年，恰好是40年。今年我又刚好年满花甲，似乎到了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做一个阶段性盘点的时候了。感谢三联书店，给了我一个出版系列作品集的机会。本系列分为三册，第一册《无穷的困惑》，是1988年出版的处女作，是我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专著；第二册《民间与庙堂》，是对当代中国思潮与知识分子的思考；第三册《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是我的社会文化评论集精选。这三册作品集，跨度从历史到当下，从思想到政治，从文史到哲学，见证了我作为一个学者的狐狸性格。

这一狐狸性格，从我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奠定了某种基因。在中学时期，我原本是一枚文学青年。20世纪70年代“文革”期间，上海有两本著名的刊物，一本是文学刊物《朝霞》，另一本是时论刊物《学习与批判》。能够在上面发文章的人，在一个中学生眼里，都是不得了的大人物。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朝霞》，也曾经将自己稚嫩到不堪的小说向杂志社投过稿。当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毫不犹豫地填上的第一志愿，便是中文系，梦想当一个作家。可惜命运阴差阳错，将我录取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当时的政治教育系，囊括后来

的五个一级学科：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学的课程颇为庞杂，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到上述五大学科的基本知识，皆一一涉猎。我的广泛兴趣和跨学科视野，就是在本科学习时播下的种子。

1982年大学毕业后留系任教，组织上分配我从事中国民主党派史的教学和研究。我对民主党派兴趣不大，而民主党派中那些大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却强烈地吸引了我，于是五年时间埋首图书馆，坐冷板凳，研读史料。不过，我的个性，犹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乃“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学问中人”，关心的只是历史真实，将“是什么”搞清楚，便一了心愿。但“问题中人”却不满足于此，非要刨根追底，在史料背后寻找终极的动因，追问“为什么”或“何以如此”？假如只是满足于“是什么”，专业的知识足矣，有一套史料的收集、考证和比勘功夫，便能成为一个不错的专家，但要能够从“是什么”深入到“何以如此”，专业的功夫就远远不够，需要更广博的知识背景和综合眼光，才能对复杂的历史成因有一个深入的分析。历史学不仅在于“求真”，而且也在于“求解”。史实总是支离破碎的，只有置于一定的理解图景之下，镶嵌在各种文化、政治和社会网络之中，整体的真相才会浮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理解，就没有真相。

20世纪80年代我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和个案的研究，借助当时的中西文化比较的时代大背景，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变迁置于新旧文化的矛盾冲突之中，围绕为何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这一中心问题写了几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不期而然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反响。与其说是这些少作在学术上写得多么好，不如说切中了若干时代的大问题。

十年之后，待我读到张灏教授以及他的老师史华慈教授的思想史研究，突然有一种被照亮之感，我才明白，我在80年代完全不自觉的尝

试，其实是一种“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没有问题意识，就等于一篇文章失去了灵魂，看上去规范完整、条理清晰，其实只有一种编年史式的表层真实性，有时候还会形成一种作者意识不到的虚假的因果关系。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研究者才会紧紧围绕问题核心，筛选（而不是铺排）史料，步步分析，最后对核心问题作出自己有创见的回答。史华慈教授和张灏教授在这方面作出了典范性研究，我将之称为“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在我遭遇史华慈和张灏之前，我的研究其实是没有家法的“野路子”。所谓“野路子”，乃是类似今日所谓的“民科”，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没有明确的学术传统，也不遵守一定的家规家法。大凡“民科”，都有不凡的天分，但仅仅凭一己之聪明与勤奋，能够解决的问题终究有限，往往是最得意之处，前人其实早就有了很好的论述。学术的进步是累积的，总是在一定的研究范式下的点滴进步，即使发生范式革命，也是在原有范式基础上的突破，而非像孙悟空那样从无到有地从石头里蹦出来。对自己的学术传承越早有认同，就越能有一种学术自觉。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知识分子研究转向思想史研究，将知识分子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接上的正是这一“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研究家法，至今受益良多。当然，任何一种家法，既是赐福，也是限制。遵循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在家法之中，又超越家法。这是更高境界的突破。

大凡一个成功的研究延续一段时间，便会产生路径依赖，研究者驾轻就熟，不断重复自己，即使想有所变化，也感觉身不由己，就如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经历了一场类似的危机，虽然约稿不断，但感觉自己已经江郎才尽，而我最讨厌的，乃是同一个模式的生产与再生产。怎么办？在这个时候，最好是“后退一步，远眺彼方”。我在90年代初，邀集一批学术上志同道合者，

如贾新民、孙立平、高华、杨念群、严搏非等，一起撰写《中国现代化史》。我负责“总论”和“战后国民党”两章，借此机会，从知识分子的研究走向更广阔的历史与政治舞台，鸟瞰 20 世纪的中国。有了这段登上山巅的经历，当我 90 年代末重新回到知识分子研究领域，视野和格局比之前开阔了许多，不仅从文化的维度，而且从思想与政治的互动来思考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一个学者在研究过程当中遭遇瓶颈是经常的事，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时刻，与其苦思冥想，钻牛角尖，不如暂时放下，跳出来“远眺彼方”。当你将镜头拉开，拓宽视野之后，只要心中存着问题，往往会不期而然地发现“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外惊喜。

一篇文章的灵魂是问题意识，问题意识究竟何来？一个源头是对历史本身的观察与了解，你所知越多，便越加能够如胡适所说“在不疑处有疑”。然而，历史是上几代人的经历，对研究者而言皆是“所闻之世”，缺乏亲身的感受，倘若仅仅阅读资料，很难还原出活生生的历史真相。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有些研究共和国史的年轻学者，掌握的都是真实的档案资料，但描述的整体图景却似是而非，让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一代学者感到啼笑皆非。历史学如同文学、科学一样，都需要想象力。想象力的一部分真实性来自历史，另一部分却来源于对当下的感受。一个学者越是对当下的语境有深刻的感受和真切的情怀，他对历史的理解就越具有穿透力。历史之于现实，是借鉴之镜；现实之于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我这些年的研究，经常游走于历史与当下之间，当下的社会文化观察与近代的历史研究，并非互不相干的两张皮，而是有其内在的历史脉络，倘若你对历史与现实只知其一，必定找不到二者的隐秘逻辑。从历史思考现实，从当下返观过去，不啻是我的研究特色，个中的经验可以为年轻学者参考借鉴。

刺猬有一知，狐狸有多知。当以赛亚·伯林以刺猬和狐狸形容学者的

不同气质的时候，只是说明刺猬为学严谨专一，热衷于建立体系，而狐狸治学潇洒广博，对什么都有兴趣而已。刺猬更多的是收敛性思维，而狐狸的特长是发散性思维。刺猬与狐狸，各有短长，无高低之分。少年时代的作家梦想和大学时代的多学科训练，虽然让我兴趣广泛，在气质上更接近狐狸，但这些学科与传统的文史不同，多是概念性、体系性的哲学社会科学，它们又让我在思维和表达上接近刺猬。在90年代末，为了思想史研究的严谨性，我曾经苦读过政治哲学，一度迷恋于约翰·罗尔斯，体系之于我，不是完全没有吸引力的。然而，我最欣赏的，依然是以赛亚·伯林那样的挥洒自如、散而不“散”的为学风格。刺猬对于我，只是“用”，而狐狸，才是“体”，可谓狐狸为体，刺猬为用。因而读者可以理解，我的作品集表面看起来散漫无边，但在在我看来，应该是形散神不散，背后所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即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关怀。

是为序。

作者谨识

2017年酷暑于沪上樱园



# 目 录

## 俗世社会的内在紧张

大众文化的冷峻反省 3

大众文化时代的青年性格 13

终极关怀与现代化 20

世俗化与超越世界的解体 30

21 世纪的世界：世俗化与宗教的永恒冲突 39

## 家国天下的关怀

信仰、专业和卓越：从文化角度解读“工匠精神” 57

市民社会与日常生活中传统礼仪的传承 72

“9·11”事件与全球正义 79

两个美国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困境 101

从东邻日本看高扬传统的得失 112

从欧洲历史看贵族精神 124

## 南北城市情

魔都与帝都：近代中国双城记中的知识分子 133

上海文化传统与现状的反思 143

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 155

城市风情依旧，文化何处寻觅？ 169

中国城市空间与城市文化的反思 175

## 港台文化风

文化与文明：上海人与香港人 187

两难困境中的殖民历史遗产 190

香港：文化大都市之梦 194

亚细亚孤儿的迷惘：四代台湾人的文化与身份认同 201

## 一个非批评家的文化批评

希望的春天与绝望的冬天 213

虚妄的都市批判 221

俗世中的时尚 229

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

——关于“张爱玲热”的断想 236

无奈中的美丽神话 245

## 大众文化的诗坛反省

## 俗世社会的 内在紧张



## 大众文化的冷峻反省

在台湾学者同行之中，我一向比较喜欢杭之的文字。他的社会文化评论，不似有些人写得那般潇洒、飘逸，见灵性，但看得出是下过苦功、苦力、苦思，凭借这些年自学累积的深厚思想资源，慢慢琢磨出来的。因此他的文字要比一般人厚实、深邃，也格外耐读。1991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一苇集》，收集了杭之在20世纪80年代陆陆续续撰写的二十多篇评论，乍看上去，内容似乎很散，从学术、教育、文化到公害，无所不谈。通览之后，便会凸现出一个清晰的主题：在现代化四面凯歌的社会中，如何对现代性本身保持冷峻的反省？

### —

自欧美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以来，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似乎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无可置疑的参照示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崛起的现代化理论，就是试图为不发达地区移植西方经验建构一套目标——行动系统。这一理论的基本预设建立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上，尽管在理论表述上具有结构功能主义的种种“价值中立”的表征，但在其整个分析系统的背后却包含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即将“传统”等同于落后，将“现代”理解为发展这样的二元化思路；将整个世

界分为“中心”（欧美）与“边缘”（亚非拉）两个等级，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就是朝着西方世界已经显现的若干“现代性”变量（如城市化、契约化、科层化、理性化、民主化等）靠拢接近的过程。

杭之在序论中指出，这是帕森斯之流对韦伯思想的最大误读。马克斯·韦伯是最早对现代社会做出深刻、精微分析的思想家之一，也是现代化理论的主要思想渊源。然而帕森斯这些美国社会学家却将韦伯复杂的思想庸俗化、简单化了。从哲学的角度而言，现代化真正的思想启动点是笛卡儿的理性主义。“我思故我在”为人类奠定了一个全新的自我确证基础，不再是冥冥中的上帝或任何不可知的神秘之物，而是人自身的“自我意识”。根据这种革命性的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颠覆与裂变，人不再是世界的一部分或世界的产物，而成为以自我量度世界、征服世界的独立主体。世界对于人类来说也不再是一个充满迷魅或巫术的存在，而只不过是一个人的理性完全可以把握的因果机制。现代人日益从迷魅中解放出来，获得自己理解世界、控制世界的立体性地位，这就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除迷魅”（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人类可以通过系统的、有目的的、持续的理性化过程，一步步地支配世界，转换世界，“整个现代性的历史就是在立体性优位的新导向下，完成塑造现代文明价值与制度结构的历史”<sup>〔1〕</sup>。正如美国社会学家 E. 希尔斯所说：“达到理性化理想的那个过程的名称本身就相当重要；人们给它起了‘现代化’的名称。”<sup>〔2〕</sup>

对这种高度理性化的现代化过程怀有什么样的期待，构成了韦伯与后来的现代化理论家的重大区别。现代化理论家以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姿

〔1〕 杭之：《一苇集》，序论，1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2〕（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态，将人类的发展视作一个绝对进步的过程，相信人类的理性能够构造出一个合理、高效、幸福的社会。然而韦伯对现代化发展前景的估计却复杂、深邃得多。韦伯将理性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种。从历史的发生学过程来看，新教伦理这一价值理性在世俗生活中现实展开的结果，产生了相当工具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是，一旦工具理性化过程展开了，其形式结构就依循自身的内在逻辑发展演进，日益摆脱价值理性的制约、驾驭，成为凌驾一切的自在目的。这种成为资本主义普遍精神的工具理性，从功能、效率、手段和程序来说是充分合理的，这也是为现代化理论家所经常津津乐道之处。但在韦伯看来，这种纯粹的工具合理性背后却掩盖着实质不合理的一面。由于其失却了终极价值的依托，失却了对生命存在意义的反思，因此工具理性最终走向了“理性的暴政”。商品经济、科层制、理性主义全面发达了，人从自然界和宗教的蒙昧中解放出来，却又为理性的自身创造物所奴役，成为机器的、商品的和官僚制的奴隶。韦伯对这一前景深感忧虑，他毕生都在为如何走出现代化过程中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二律背反的迷宫而殚思竭虑。韦伯的这种思想与马克思早年的异化理论多有共鸣之处，其后的卢卡奇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就承继了“二马”的这一思路，构建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

由于现代化理论片面简化了韦伯的理性概念，只在工具理性的范畴中做文章，因而它几乎失却了反省、批判现代化的思想资源。杭之痛感于此，他重新回到韦伯，对台湾工商社会，尤其是它的大众文化作出了全方位的检讨和清算。

## 二

在《一苇集》中，杭之将较多的篇幅留给了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他对战后台湾文化主潮的变迁有一个十分精辟的概括：50年代政治保守主义君临一切，文化价值普遍染有以政治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色彩；60年代

西化派平地崛起，在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领域对传统与权威发动全面攻击；70年代台湾在国际政治上成为孤岛，种种困境使知识分子产生了回归、认同文化本土的自觉运动；到80年代，随着工商社会的最后奠定，消费性的大众文化涤荡一切，成为方兴未艾的文化大潮。

关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一般人在使用此概念时常常将它同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民俗文化（folk culture）混同，杭之对此作了严格区分。他指出：通俗文化源于大多数人的实际生活，具有人类学内涵；民俗文化则是指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群体所有的文化；而大众文化，则特指“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透过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大众传播媒介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这是一种合成的（synthetic）、加工的（processed）文化产品，其明显的特征是‘它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因而它有着标准化和拟似个性（pseudo-individuality）的特色”<sup>〔1〕</sup>。

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大众文化成为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指出的“文化工业”现象。大众文化的产品像工业社会的其他商品一样，可以借助大众传媒以标准化的模式批量生产，用于满足大众的精神消费，愉悦、刺激大众平庸的日常生活。像畅销小说、热门影视、流行音乐、时装表演、卡拉OK、广告艺术这类消费文化，通过与商业的强有力联姻，迅速弥漫到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建立起自己的文化霸权，主宰着城市生活的节奏和色彩，左右着大众游移不定的消费取向和审美情趣，甚至成为一部分都市青年赖以生存的日常宗教和世俗信仰。

大众文化日益成为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是人类自身创造的文化客体，然而一旦人们置身于这种意识形态，就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为自己的创造物所摆布、奴役，成为它所操纵、控制的客体，

〔1〕 杭之：《一苇集》，141页。



大众沦为“文化工业”的“受众”。

从表面来看，工业社会的人们是充分自由的，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商品，他可以做自主的选择。实际上，早在他做出选择之前，他已经被选择了。工业社会的人们已经失却了自己的内心自由，失却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信念，失却了自主选择所必需的最起码的思想资源。他如同美国社会学家理斯曼所描绘的，已经成为一个“他人引导”型的人。各种各样显性的、隐性的广告原型预设性地摆布着他的思绪，操纵着他的抉择，他已全然失落了仅仅属于他自身的那份价值与信念，一味地追逐流行和时髦，注意公众形象和社会评价；人被角色异化，形象代替了自我，人的个性和内在的灵魂已被剥夺殆尽，成为一个内心已被掏空的、非真实化的蜡像。甚至当他试图说出几句个性化的语言时，语言也被“文化工业”标准化、一律化了。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逊说得很好：“我们的头脑塞满了五花八门的程式化的语言。逐渐地，当我们自己以为是在表达自己的感情时，我们只不过是在使用些陈词滥调罢了……我们只不过被一堆语言垃圾所充斥。我们自以为在思维，在表达，其实只不过是模仿那些早已被我们接受了思想和语言。”<sup>[1]</sup>

这一切都是大众文化活生生的杰作。在商品社会里，“权威并非消失了，而只是转变为看不到的、我们叫他‘匿名’的权威，他伪装成一般常识、科学、心理健康、正常状态、公众舆论等，再也发现不了命令与压迫，代之而起的是温和的说服”<sup>[2]</sup>。谁要是不服从，或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虽然没有杀身之祸，却面临着被排斥于大众社会之外的威胁，“落伍”“怪诞”“精神不正常”之类指责会悄悄包围你，让你孤独，让你

[1] (美) 弗·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161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 (德) 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陈学明译，102页，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